

· 文学文献研究 ·

许浑诗集的稿本与定本之辨

赵 庶 洋

内容摘要: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六所收唐代诗人许浑乌丝栏诗真迹,乃是许浑生前亲手抄录,与许浑诗集传世宋、元刻本在文字上存在众多差异,有学者认为它代表了许浑诗原貌,在校订整理时将之作为首选底本。但是通过对乌丝栏诗真迹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一写本上有许浑修改的痕迹,而且其抄写时间距离许浑去世尚有十年之久,此后仍有继续修改和增补的可能,其中诗歌编排也无义例可言,应当只是许浑诗歌的一个稿本,而非最终定本。宋蜀刻本《许用晦文集》文字与乌丝栏诗真迹的异文大多不是文字讹误所致,也并非出于后人改动,应当是许浑亲手所改,代表的是许浑诗集定本的面貌。

关键词:许浑 唐诗 异文

存世唐人诗集数量众多,多数都是经唐以后历代抄写刻印流传者,二十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大量唐、五代、北宋时期的写本,也都不是作者自书,真正可确认为诗人本人亲手抄写的,只有杜牧《张好好诗》和《石渠宝笈》著录李郢自书诗卷(原迹下落不明)等寥寥数件,每一件都有非常珍贵的价值。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的南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一书中收唐代著名诗人许浑手书乌丝栏诗真迹一卷,也是其中之一。许浑诗集真迹虽然已经亡佚,但岳氏书中详尽的录文基本保存了真迹的面貌,对许浑诗歌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者以之与传世许浑诗集对比,发现二者之间差异非常多,甚至连诗题中酬赠对象的姓名等关键信息都有不同。由于乌丝栏诗真迹为许浑生前亲笔所书,所以历来研究者多认为真迹保存了许浑诗原貌,而传世诸本则在刊刻时经过后人改动。因此,在乌丝栏诗存诗只有许浑现有诗作数量三分之一的情况下,仍有学者在整理许浑诗集时将其作为底本,而以传世宋、元诸本文字进行参校,此外诗作方以宋元

本文字作底本^①。

问题是,乌丝栏诗固然出于许浑亲笔所作,但是否为许浑诗集的最终定本尚有疑问;仅因宋元本文字差异较多便断定出自宋元人改动,也并无实据,实际上误判了乌丝栏诗真迹与许浑诗集传世版本之间的真正关系。因此,本文拟以乌丝栏诗与传世版本中时代最早、存诗数量较多的宋蜀刻本进行对比^②,探讨二者之间异文的性质,重新认识许浑诗集的形成和流传过程,从而准确判断乌丝栏诗真迹与传世诸本在许浑诗集版本系统中的地位。

一、乌丝栏诗真迹情况分析

乌丝栏诗真迹目前所见最早的著录是北宋徽宗年间所编《宣和书谱》,该书卷五记载:

许浑,不知何许人也。总角为诗,已能超出童稚。及长秀发,颇为流辈所推。正书字虽非专门,而洒落可爱,想见其风度。浑作诗似杜牧,俊逸不及,而美丽过之。古今学诗者,无不喜诵,故浑之名益著,而字画因之而并行也。大中初,守监察御史,以疾告归,端居佚老,有诗集行于世。今御府所藏正书二:今体诗上下。乌丝栏。^③

南宋时此卷流出御府,曾为岳珂所藏,《宝真斋法书赞》介绍了岳氏所得真迹的详细情况:

右唐郢州刺史许浑所书乌丝栏诗一百七十一篇真迹,分上下,凡二卷。织组间错,辞格华古,笔妙烂然,见为三绝。浑本丹阳人,居丁卯

①如罗时进《丁卯集笺证》(中华书局,2012年)一书诗篇编次依据《全唐诗》中《许浑集》,底本文字择善而从,凡乌丝栏诗中所有之诗作,文字均据之录校,即是认定乌丝栏诗文字优于后世版本所采取的变通之举;陈尚君在《许浑乌丝栏诗真迹与传世许集宋元刊本关系比较分析》中亦云“我反复斟酌后,最后决定许浑诗的写定,以殿本《宝真斋法书赞》卷六所录乌丝栏诗真迹为前三卷,贵其出许浑本人所书;以蜀本所收真迹以外诗为四至六卷;以书棚本所增诗为第七卷;以元本所增诗为第八卷……”(《唐诗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562页),与《丁卯集笺证》的做法一致,也以乌丝栏诗真迹作为首选。

②许浑诗集版本众多,据乌丝栏诗真迹许浑自序知其在世时已有结集,宋代多有刊刻,至今尚存南宋四川地区刊刻的《许用晦文集》二卷(以下简称“蜀刻本”)附《许郢州诗拾遗》(以下简称“《拾遗》”)、《许用晦拾遗篇》和南宋临安府书棚所刻《丁卯集》二卷(以下简称“书棚本”),书棚本除无《拾遗》《拾遗篇》外,与蜀刻本基本一致。元代祝德子刊《增广音注唐郢州刺史丁卯诗集》二卷,在二本基础上又于诗篇略有增加。后世诸本多从宋、元本出。

③佚名编:《宣和书谱》卷五,明嘉靖刻本。

涧。予再仕是邦,每过其旧居,退揽云山,慨想清致,未尝不过车而式也。安阳刘泾巨济,故与宝晋同时,博雅尚古,诗藏其家,盖与太冲序俱在秘籍第一物之数。尝剪一幅易与杜介,又一幅在驸马都尉王诜第,《书史》具焉。字法柳而不俗,信乎其确论也。予家旧传幅绢帖,知其为晚唐诗。嘉定癸未岁,客有自中都携来者,始见首卷,制作吻合。序著五百余篇,合两者才得六十五首,冥搜逾年,复得后一卷,略计所存未及半,岂犹有待耶?然《书史》谓泾所藏止百篇,又岂未尽睹耶?度王、杜之所分蓄,固已具是矣。剑津再合,已焕龙文;珠浦复还,益彰螭贡。两卷皆印绍兴御玺,又有一半印,盖唐诗之存而帝玺之信,莫此若者。^①

岳珂的记载对于了解许浑手迹在南北宋之际的分合经历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线索,而真迹中保存的许浑自序对于了解这份写本的性质至为关键,移录如下:

余卅岁业诗,长不知难,虽志有所尚,而才无可观。大中三年,守监察御史,抱疾,不任朝谒,坚乞东归。明年少间,端居多暇,因編集新旧五百篇,置于几案,聊用自适,非求知之志也。时庚午岁三月十九日于丁卯涧村舍手写此本。

这篇自序中有两处重要的信息值得特别注意:第一,“端居多暇,因編集新旧五百篇”,可见许浑此前尚未編集过自己的诗集,这是首次结集;第二,“庚午岁”这一时间,据许浑生平知为唐宣宗大中四年(850),这一年许浑还乡。据学者研究,许浑约卒于咸通初年(860年左右)^②,后于真迹抄成时间约十年。这十年之中,许浑陆续写有新的诗作,这些诗作显然不可能抄入大中四年的集本之中^③。因此,这一大中四年的真迹虽为许浑亲笔所作,但只是初次结集,而且其中不收晚年诗作,从这两点来看,应当不是许浑诗集的定本,在此后十年之中,许浑很可能会对其进行修订或增删。

实际上,真迹中确实有修订的痕迹。岳珂不仅抄录乌丝栏诗真迹的正文,甚至将真迹中许浑改动的痕迹也忠实地记录下来。如《送萧处士归缙氏别业》诗“缙山住近吹笙庙”句下注云“‘山’字元作‘氏’字,注改”;《南海府罢南康阻浅行侣稍稍登陆而遇宴饯至频暮宿东溪》题下注云“‘而遇’二字元作‘至而频’字,系注改”;《行次潼关驿》诗“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句注

①岳珂撰:《宝真斋法书赞》,《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15626-15644页。下文所引乌丝栏真迹均出此本,不另注。

②罗时进:《丁卯集笺证前言》,第6页。

③罗时进《丁卯集笺证前言》云:“由于(乌丝栏诗真迹)编辑较早,故晚年之作不在其集。”(第19页)

云“内‘残云疏雨’联,元作‘远帆春雨阔,高寺夕阳条^①’”;《岁暮自广江至新兴往复道中留题峡山寺》“古木花生斛”句注云“内‘花’字元作‘古’,改作‘高’,又注作‘花’”。这些改动显然不是改正字划讹误,而是诗人对此前诗文不满意而作的加工。这种尚在修改阶段的文本与一般著作最终定稿时誊清写定的情况有别,应该只是一份修改稿。序文中言及抄录这些诗作的目的是“聊用自适,非求知之志也”,这与一般人编集以求传世的目的也不同。换言之,此次所抄之本,在许浑本人看来,只是供自己阅读,尚不能视作可供他人观览的定本,故而在重新审视旧作时遇有不满意处辄随手修订以求更加完善。

此外,唐五代人所编诗集,如白居易自定《白氏长庆集》以题材分类为主而兼顾分别五、七言体;李绅自编《追昔游集》以时间为序;孙光宪编齐己《白莲集》前九卷为近体诗,第十卷为古体诗;五代后蜀县域编贯休《禅月集》以乐府、古风、五律等体为次,于篇目次序的编排上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均有一定义例可循。乌丝栏诗真迹不分体,不编年,又无义例可言,与唐人编定文集的通行做法不符,应当也与其尚为稿本有关。相比起来,蜀刻本上卷为七言,下卷为五言,已有明确的编排。

鉴于上述三点,乌丝栏诗虽然由许浑亲笔所书,但应当只是其诗集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是稿本而非定本。

二、宋元本是否在刊刻时遭到后人改动?

许浑集宋元诸本文字确实与乌丝栏诗存在众多异文,为何会出现这些差异?有学者认为这是宋元人在编校时所作改动^②。宋元本在刊刻时是否有任何妄改之事,直接关系其可靠与否。今以蜀刻本为例进行验证。

在蜀刻本与乌丝栏诗真迹的众多差异之中,诗题的差异尤其引人注目,如乌丝栏诗真迹《咸阳西门城楼晚眺》一首,蜀刻本作《咸阳城东楼》;乌丝栏诗真迹《故洛城》一首,蜀刻本作《登故洛阳城》;乌丝栏诗真迹《宿松江驿却寄苏州一二同志》一首,蜀刻本作《宿望亭馆寄苏州一二同志》,远非讹脱衍倒所能解释,若假设为宋人所改,亦难以解释其动机。实际上,有证据显示早在蜀刻本之前许浑诗题的面貌已经如此。

①“条”字疑当作“多”,《才调集》卷七(转引自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中华书局,2014年,第111页)、《文苑英华》卷二三八(李昉等:《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第1198页)录此诗均作“高寺夕阳多”。

②陈尚君《许浑乌丝栏诗真迹与传世许集宋元刊本关系比较分析》云:“根据真迹,可以知道宋元人在编校许集诗,对原题改动甚大。”(《唐诗求是》,第552页)

五代韦穀所编《才调集》卷七收录许浑诗二十首,其中有八首亦见于乌丝栏诗真迹之中。兹以其诗题与乌丝栏诗真迹、宋蜀刻本之诗题加以对比,制为表1如下:

表 1

序号	乌丝栏诗真迹	《才调集》	蜀刻本
1	塞下	塞下曲	塞下
2	放猿	放猿	放猿
3	春望	春望	南楼春望
4	南游泊松江驿	南游泊船江驿	泊松江渡
5	登凌歊台	凌歊台	凌歊台
6	咸阳西门城楼晚眺	咸阳城东楼	咸阳城东楼
7	凌歊台送韦秀才	凌歊台送韦秀才	凌歊台送韦秀才
8	秋日候朝	秋日早朝	秋日早朝

在这八首诗中,三者诗题均相同者二首,各不相同者一首,乌丝栏诗真迹、《才调集》同而与蜀刻本不同者一首,乌丝栏诗真迹、蜀刻本同而与《才调集》不同者一首,其余三首为《才调集》、蜀刻本同而与乌丝栏诗真迹不同。最后一种情况对于本节所讨论的问题最为重要,说明蜀刻本与乌丝栏诗真迹在诗题上的这些差异并非宋元人所改,而是早在五代时期已经存在。

韦穀为五代后蜀人,《才调集》中所录许浑诗代表五代时期蜀地流传的许集文本面貌,而这一文本面貌与两百年后蜀地刊刻的许集之间存在一致性,可见蜀地流传许集文本渊源有自。

北宋王安石所编《唐百家诗选》卷十六收许浑诗三十三首,其中十六首见于乌丝栏诗真迹,今将其诗题文字与乌丝栏诗真迹、蜀刻本对比,制为表2如下:

表 2

序号	乌丝栏诗真迹	《唐百家诗选》	蜀刻本
1	登凌歊台	凌歊台	凌歊台
2	送萧处士归缙氏别业	送萧处士归缙岭别业	送萧处士归缙岭别业
3	赠萧兵曹先辈	赠萧兵曹	赠萧兵曹
4	凌歊台送韦秀才	凌歊台送韦秀才	凌歊台送韦秀才
5	送岭南卢判官罢职归华阴别墅	送岭南卢判官罢职归华阴山居	送岭南卢判官罢职归华阴山居
6	故洛城	登故洛阳城	登故洛阳城

续表

序号	乌丝栏诗真迹	《唐百家诗选》	蜀刻本
7	伤虞将军	哭虞将军	哭虞将军
8	尝与故宋补阙次都秋夕游 永泰寺后湖今复登赏怆然 有感	尝与故宋补阙秋夕游 练湖南亭今复登赏怆 然有感	重游练湖怀旧
9	题卫将军庙	题卫将军庙	题卫将军庙
10	岁暮自广江至新兴往复道 中留题峡山寺四首	岁暮自广江至新兴往 复中道留题峡山寺 四首	岁暮自广江至新兴往 复中题峡山寺四首
11	寄题商山王隐士居	寄题商洛王隐居	寄题商洛王隐居
12	别韦处士	别韦处士	别韦处士
13	春日题韦曲席野老所居	春日题韦曲野老村舍	春日题韦曲野老村舍
14	题倪处士旧居	题倪处士旧居	题倪处士旧居
15	江上喜洛中友人继至	江上喜洛中亲友继至	江上喜洛中亲友继至
16	送从兄别驾归蜀	送从兄别驾归蜀川	送从兄别驾归蜀川

在十六首诗作中,三者诗题完全相同者四首,完全不同者二首,其余十首均为《唐百家诗选》、蜀刻本同而与乌丝栏诗真迹不同者。

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所据文本,据其序所言乃其“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时,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馀编”^①,宋次道即北宋著名藏书家宋敏求,藏书以精善著称^②,其所藏许集版本与蜀刻本之间高度一致,说明蜀刻本诗题面貌早在北宋时期即已如此。

诗题之外,《唐百家诗选》所收三十三首诗作,先列七言十九首,后列五言十四首,与其他诗人五、七言杂列的情况不同^③,应当不是王安石刻意安排,而是所据底本如此,这一顺序与蜀刻本的编排一致,而且《唐百家诗选》七言前十七首和五言十四首的先后排列顺序均与蜀刻本一致,只有七言末《秋晚云阳驿西亭莲花池》《题卫将军庙》二首顺序略有参差,这种排序上的一致性显示出蜀刻本之祖本与宋敏求藏本之间当有密切关系,可见许集的

①王安石:《唐百家诗选》,《王安石全集》第八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71页。

②朱弁《曲洫旧闻》卷四云:“宋次道龙图……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世之畜书,以宋为善本。”(中华书局,2002年,第141页)

③如卷一孟浩然诗三十三首,卷二、卷三高适诗七十二首,卷三、卷四岑参诗八十一首均为五、七言杂列。

面貌至迟在北宋时已经基本定型。

《才调集》《唐百家诗选》时代不同,地域有别,恰好代表了许浑集五代至北宋时期在蜀地、汴梁这两个不同地区的流传情况,上承唐代流传之本,下启南宋蜀刻本和书棚本,是许浑集流传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环节。这两种文本均与蜀刻本的面貌相当一致,可见蜀刻本虽是南宋刻本,但其祖本源头甚古,较为忠实地保存了许浑集面貌,并未遭到后人随意妄改。所谓宋元本遭到后人改动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三、乌丝栏诗真迹与蜀刻本异文性质探索

既然乌丝栏诗真迹为许浑亲笔所书,蜀刻本祖本源头又甚古,二者之间为何会有这么多异文?这些异文应如何解释?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学者重视乌丝栏诗真迹,是因为其中异文能够提供众多关于许浑诗的原始信息,诸如赠答对象、作诗主旨、具体细节等,对研究许浑生平及其诗作均有重要价值。但是,这是从后世研究者角度来考虑的,诗人本人在对诗作进行修改时,这些因素恐怕不是他最看重的,诗人追求的乃是以自己对于诗歌艺术的理解对诗作进行改动,这种改动可以包括上举诸种,也可能出于种种原因而做出与之相反的举动。因此,仅凭乌丝栏诗真迹保存了一些原始面貌尚不足以说明问题。

其实,相较于诗题差异,诗歌正文差异的对比更能说明问题。这些异文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字体形近讹误导致的版本异文,这是版本流传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本文重点关注的是第二种,即乌丝栏诗真迹与蜀刻本之间那些于各自文本均可通解、无法简单归结为文字讹误的异文。据笔者统计,存在这种异文的诗作数量在乌丝栏诗总共一百七十一首诗中达一百四十四首之多,也就是说乌丝栏诗中绝大部分诗作都与蜀刻本之间存在此种异文,二本文字完全相同者仅为少数,其中每首诗中异文超过三处者达三十二首,占乌丝栏诗真迹录诗总数的五分之一弱,如许浑七律名作《凌歊台》一首二本异文即有八处,《题卫将军庙》一首若连序中异文计有十八处。若为后人校改,这么大规模的改动前人诗作无异于重新创作,无特殊原因断不会有人如此校订前人诗作。而且,仔细分析这些异文,尚能体会到其中修改的用意。今择其中数例加以分析。

叙事文字的异文较为明显,如《题卫将军庙》诗序(见表3):

表 3

乌丝栏诗真迹	蜀刻本
将军名逖,阳羨人。少习诗书,仍学剑,有武略。二十七,游并、汾间,神尧皇帝始揭义旗,逖进备行列。洎擒窦建德,逖持挟枪剑,前突后翼,太宗顾而多之。……及卒,邑人怀之,庙于荆溪之湄,以平生弓甲悬东西庑下,岁时祠祭焉,或云颇福其土邑。文士王敖撰碑,辞实详备,惜乎国史阙载其功,因题是诗于庙壁。	将军名逖,阳羨人。少习诗书,学弓剑,有武略。二十七,游并、汾间,遇神尧皇帝始建义旗,逖以勇艺进备行列。洎擒窦建德,逖时挟枪剑,前突后翼,太宗顾而奇之。……及卒,邑人怀其贤,庙宇荆溪之湄,以平生弓甲悬东西庑下,岁时祠祭,颇福其土焉。文士王敖撰碑,辞实详备,惜乎国史阙书其人,因题是诗于庙壁。

蜀刻本言卫将军“学弓剑”较之乌丝栏诗作“仍学剑”记载更加完备;“逖以勇艺进备行列”中蜀刻本“以勇艺”三字之增有助于解释卫逖之才能;“太宗顾而奇之”之“奇”乌丝栏诗作“多”,“奇”字更能凸显卫逖于战场表现得到太宗赏识之情境;蜀刻本“邑人怀其贤”较乌丝栏诗作“邑人怀之”更加具体;蜀刻本“国史阙书其人”较乌丝栏诗“国史阙载其功”更加全面,涵盖卫逖的军功与生平两方面。

又如《岁暮自广江至新兴往复中题峡山寺四首》之自注“媪龙”,蜀刻本作“即蛇也,随来往舟船至人家,或千里外,皆以香酒果送之”,乌丝栏诗作“状如蛇,常迎送舟楫,或千里之外。人多以金帛香火送之”,蜀刻本更加流畅,语意也更明晰,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此“媪龙”即蛇,而乌丝栏诗用“状如蛇”则语意较为含混。

诗文方面,《赠萧兵曹》一首异文较多,也比较有代表性(见表4):

表 4

乌丝栏诗真迹	蜀刻本
广陵堤上昔离居,帆转湘南万里馀。 楚泽病时无鵬鸟,越江归处有鲈鱼。 潮生水国蒹葭响,雨过山村橘柚疏。 闻道携琴还载酒,临邛休羨马相如。	广陵堤上昔离居,帆转潇湘万里馀。 楚客病时无鵬鸟,越乡归处有鲈鱼。 潮生水郭蒹葭响,雨过山城橘柚疏。 闻说携琴兼载酒,邑人争识马相如。

颌联中乌丝栏诗真迹原以“楚泽”对“越江”,言其所处之地;蜀刻本之“楚客”对“越乡”,不仅能够交待两个地点,而且进一步揭示楚、越二地对于萧兵曹之不同意义:楚为异乡,越为故乡。“客”的身份与“病时无鵬鸟”,“乡”的意象与“归处有鲈鱼”,均密合无间,较之乌丝栏诗真迹中的“楚泽”“越江”在含蕴上更加丰富。尾联乌丝栏诗真迹作“临邛休羨马相如”,意即萧兵曹之文采风流较之司马相如不遑多让,蜀刻本作“邑人争识马相如”,不仅将萧

兵曹比作司马相如,又进而展望其回乡后受乡人钦敬之情景,既切合送人主题,又使诗意更加宛转有致。

此外,如《神女祠》首句蜀刻本作“停车祠圣女”,乌丝栏诗真迹作“停车一卮酒”,结合全诗来看,“祠圣女”直接表明行至神女祠停车祭奠神女,相较而言,乌丝栏诗真迹作“一卮酒”,若非结合全诗语境,乍看或误以为停车饮酒之事,使诗句有产生歧解的可能;《放猿》蜀刻本末句“好觅来时路,烟萝莫共迷”之“好”字乌丝栏诗真迹作“便”,相较之下,“好”字显示出诗人对于原本豢养的猿在放生之后归程的殷殷关切之意,更富情味;《马镇西故第》蜀刻本尾联云“借问此中事,几家歌舞来”,乌丝栏诗真迹作“惟见军中卒,朝朝戏马来”,此诗乃是因马燧故居感时之作,真迹尾联紧扣主旨,极言今昔对比,蜀刻本则跳出今昔对比。许培荣在《丁卯集笺注》于此联特为欣赏,赞云:“因故第而哀镇西,并哀镇西之前、镇西之后之在此故第中者,无弗如此。镇西足知前有千古,后有万年,凡有功业者,如山长在,虽死犹生。而其但恃繁华在此中歌舞者,究竟归于乱藤丛菊,不知凡几,岂特一镇西而已,悲夫!”^①全就蜀刻本二句生发而出,可谓深得此诗三昧,与真迹末句相比,境界之高下立见。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每首诗的异文进行详细分析,但是以上几首诗基本能够代表此类异文对比的大致情况。在乌丝栏诗与蜀刻本之间做出如此大规模的改动,而且这些改动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原作,绝无可能是他人所为,只能是出于许浑本人。随着诗人创作经验的积累、人生历练的丰富,对于诗歌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杜甫即云“晚节渐于诗律细”,又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可见诗人对自己的诗作是不惮重复修改以求臻于佳境的。因此,许浑在大中四年抄写完乌丝栏诗之后的十年时间中,重新审视之前诗作并且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动是合情合理的,这应当就是导致乌丝栏诗真迹与蜀刻本之间出现众多异文的根本原因:乌丝栏诗真迹为许浑早期稿本,而蜀刻本则为晚年定本。这些异文并无对错,而是许浑诗歌文本前后变化的见证,是研究许浑诗歌创作发展和思想变化最原始也是最珍贵的材料。若将其简单归作后人改动,不仅会曲解许浑的真实用意,而且会错失这些对许浑诗歌艺术研究最宝贵的线索。

四、从稿本与定本的角度解读两组悼宋申锡诗

以上文提出的稿本与定本的区别来解读许浑诗中存在的异文,会得到许多与前人对许浑诗解读不同的全新理解。本文试以许浑诗中两组悼宋申锡诗为例。这两组诗的文本之间有非常明显的关系,但是彼此之间差异也很大,此前学者已有讨论,然尚未真正解决问题,若从稿本与定本的角度解

^①许浑撰,许培荣笺注:《丁卯集笺注》卷二,凤凰出版社,2022年,第41页。

读,可以为两者之间的差异提供合理解释。这两组诗分别见于蜀刻本和乌丝栏诗。乌丝栏诗作:

闻开江相国宋公下世二首

权门阴进夺移才,驺(按,当为“驿”字之误)骑如星堕峡来。晁氏有恩忠作祸,贾生无罪直为灾。贞魂误向崇山歿,冤气疑从汨水回。毕竟功成何处是,五湖云月一帆开。

月落清湘棹不喧,玉杯瑶瑟奠苹蘩。谁令力制乘轩鹤,自取机沉在槛猿。位极乾坤三事贵,谤兴华夏一夫冤。宵衣旰食明天子,日伏青蒲不为言。

蜀刻本卷下作:

太和初靖恭里感事

清湖(按,当为“湘”字之误)吊屈原,垂泪擷苹蘩。谤起乘轩鹤,机沉在槛猿。乾坤三事贵,华夏一夫冤。宁有唐虞世,心知不为言。

蜀刻本此诗题下注云“前有《问(闻)宋相公申锡下世》一篇,辞旨略同,但七言少异耳”,然蜀刻本上、下两卷中并无七言二首,而是在《拾遗篇》中,与乌丝栏诗所录除少数文字略有差异,大致相同。

《太和初靖恭里感事》一首确实与《闻开江相国宋公下世二首》第二首之间有渊源关系。罗时进《丁卯集笺证》改诗题作《靖恭里感事》,解题云:“诗题各本作《太和初靖恭里感事》,乃沿袭蜀刻本之误。文宗年号本作大和(八二七一八三五),许浑身当其时,绝不至于用错,且宋申锡谋诛宦官事泄,反为宦官所构陷而谪死事,在大和后期,不当称‘初’,此系宋代人读许浑诗误注于题上,蜀刻本又误植于题中。《唐音癸签》题作《靖恭里感事》,可据。”^①所持观点仍为蜀刻本文字为后人所改,然未谈及此诗与七律二首之关系。陈尚君云:“乙例以《大和初靖恭里感事》,似乎有些闪烁其词,很可能为当时所作,怯于时事而不能明言;甲例(《闻开江相国宋公下世二首》)很可能为后来写定,扩为二首,且均为更谙熟的七律,显然为在五律基础上增写而成。”^②认为五律乃是许浑初稿,乌丝栏诗中二首七律在其基础上修改而成,方为定本,这显然与前文所论蜀刻本为定本而乌丝栏诗为稿本的关系相悖。

相较而言,《闻开江相国宋公下世二首》中第二首的确诗义尖锐直白,尤其是尾联“宵衣旰食明天子,日伏青蒲不为言”,将矛头直指唐文宗本人,《太和初靖恭里感事》尾联“宁有唐虞世,心知不为言”,以“唐虞”代指唐文宗,

①罗时进:《丁卯集笺证》,第191-192页。按:唐宋文献中于“大”“太”二字多通用,“大和”写作“太和”之例甚多。

②陈尚君:《许浑乌丝栏诗真迹与传世许集宋元刊本关系比较分析》,第552页。

语意较为含蓄宛转。但是由此认为许浑作诗时有所顾忌所以诗中不明言,恐怕与许浑个性不符,许浑另有《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一首:

外监多假帝王尊,威胁偏裨势不存。才许誓心安玉垒,已伤传首动金门。三千客里宁无义,五百人中必有恩。却赖汉庭多烈士,至今犹自伏蒲轮。

首句“外监多假帝王尊”直指宦官专权,导致边将刘皋成为政治牺牲品。从诗题可以看出诗即作于事件发生不久,然此诗诗意直白尖锐完全不输《闻开江相国宋公下世二首》,可见许浑作诗并不会因怯言时事而“闪烁其词”,反而积极地以诗歌介入评论时事。

值得注意的是,《闻开江相国宋公下世二首》诗题与《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有相同之处,起首的“闻”字都表明这是许浑在听闻这些事件之后第一时间写下的诗作。与之类似,许浑诗集中有多首以“闻”为诗题首字之诗,如《闻韶州李相公移拜郴州因寄》《闻释子栖玄欲奉道因寄》《闻州中有宴寄崔大夫兼简邢群评事》《闻两河用兵因贻友人》《闻薛先辈陪大夫看早梅因寄》《闻范秀才自蜀游江湖》等,对比可知,《闻开江相国宋公下世二首》也应当是许浑听闻宋申锡去世之后所作,因此,时间当早于《太和初靖恭里感事》,与前文所论乌丝栏诗所录诗为许浑早期稿本的结论一致。

既然《闻开江相国宋公下世二首》为第一时间所作,《太和初靖恭里感事》晚作,二者之间的差异又当如何解释?其实细读两组诗,可以感受得到其中感情的强烈程度有明显差别,《闻开江相国宋公下世二首》中“权门阴进夺移才”“晁氏有恩忠作祸,贾生无罪直为灾。贞魂误向崇山歿,冤气疑从汨水回”诸句,锋芒毕露,语气中带有强烈的批评,尤其第二首尾联“宵衣旰食明天子,日伏青蒲不为言”指责唐文宗虽平日一副勤于国事的明君形象,遇到此等重要事件竟然受制于宦官而不能为解救宋申锡发一言,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可以看作是诗人以诗歌宣泄对于整个事件的愤怒之情;《太和初靖恭里感事》将《闻开江相国宋公下世二首》第二首由主感情浓烈的七律改为主含蓄蕴藉的五律,这样的选择就能看出诗人的转向,尾联改为“宁有唐虞世,心知不为言”,虽然批评之意仍在,但与“宵衣旰食明天子,日伏青蒲不为言”相比更加含蓄,应当是事易时移诗人平心静气之后对于诗作的重新修改,这种修改只是诗歌情绪的调整,诗人对于整件事的态度维持不变,仍将矛头指向不作为的唐文宗。

中国古代诗人对于诗歌的情感表达向来追求含蓄蕴藉,而非强烈直白,如《论语》载孔子欣赏《关雎》“哀而不伤”被诗人奉为创作准则,皎然《诗式》中云“气高而不怒,怒则失于风流”,也是对这种追求的表述,感情浓烈而又外露的诗歌往往会引起评论家的不满。在这一语境中审视许浑这两组诗

作,可以看出许浑所作修改正是出于他对诗歌最高境界的理解和追求,也能体会到许浑晚年创作思想的转变。

《闻开江相国宋公下世二首》和《太和初靖恭里感事》,一见于乌丝栏诗,一见于蜀刻本,一为许浑早期稿本,一为修改定本,恰好对应乌丝栏诗真迹与蜀刻本之间的关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说明乌丝栏诗、蜀刻本其他诗篇中的异文也应当如本文所论作稿本与定本的关系看待,而非出于后人妄改。

如罗时进所指出,宋申锡去世于太和五年,而太和年号使用时间仅有九年,故《太和初靖恭里感事》之“太和初”不妥,但罗氏谓“此系宋代人读许浑诗误注于诗题上,蜀刻本又误植于题中”将这一错误归为后人误改,与前此同一逻辑,然此处未必不是许浑自己犯的错误。太和五年距许浑大中四年退居已近二十年,距咸通初许浑去世则近三十年,对于二三十年前发生的事情,若非认真检阅,因记忆不清而犯错也不无可能,用“太和初”而非具体年份已经说明诗人对于这个时间的拿捏不准,所以这个错误很可能是诗人晚年记忆不准确所致^①。

值得注意的是,《闻开江相国宋公下世二首》虽不见于蜀刻本上、下两卷中,但是见于蜀刻本《拾遗篇》中,题作《闻开江宋相公申锡下世二首》,据贺铸跋乃是从“白沙沈氏本”中所辑三十七篇之一,可见正集中原无,南宋杭州所刻书棚本《丁卯集》只有上、下二卷,无《拾遗》等附卷,与《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等宋代书目的著录相同^②,可见宋代许浑集流传的原本即是上、下二卷,这个二卷本应当就是许浑诗集的定本,在宋

①古人诗文中追忆前事往往会犯错,如白居易有《初到江州寄翰林张李杜三学士》诗,朱金城据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和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指出“居易以元和十年秋贬江州。数年间张、李、杜三学士:唯张仲素十一年八月充,杜元颖十二年充,李肇十三年七月充。十三年冬居易亦改忠州刺史矣。非‘初到江州’所记有讹,则‘张、李、杜’三姓有误”(白居易撰,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78页),谢思炜指出“人物不当有误,诗题或当为‘初到忠州’。盖因编入诗集时记忆有误”(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1265页);又如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谓常衮“常吏部命为太学博士”,尹占华、韩文奇指出“常衮于大历九年十二月为礼部侍郎,十二年四月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未尝为吏部侍郎。礼部与太常寺皆职掌礼仪,疑‘吏部’为‘礼部’之讹。或柳宗元记忆有误”(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第762-763页);宋人中如欧阳修《集古录》云“庆历中,宋尚书祁在镇阳”,李之亮指出“此处欧公记忆有误。宋祁知镇州在皇祐三年至五年,而非庆历中也”(欧阳修撰,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7年,第314页),均是其例。

②今本《崇文总目》(天一阁博物馆藏明抄本)著录“《丁卯集》三卷”,当为“二卷”之误。

代一直流传,贺铸根据别本将原集中不收之诗补入其中。

五、乌丝栏诗真迹与蜀刻本诗题冲突原因推测

上文所论乌丝栏诗真迹与蜀刻本的稿本与定本的版本关系能够解释二者大部分诗题产生差异的原因,如乌丝栏诗之《京口闲居寄京都亲友》,蜀刻本作《京口闲寄京洛友人》,“京洛”兼顾长安、洛阳两地,而“京都”虽然也可释为西京、东都,却更易理解为仅指京城长安;乌丝栏诗之《秋日候朝》,蜀刻本作《秋日早朝》,诗云“龙旗尽列开金殿,雉扇才分拜玉旒”,是已经上朝,“候朝”二字不如“早朝”涵盖全诗,这些改动应该也是出自许浑本人。

但是仍有四组诗题的差异无法解释,分别是:乌丝栏诗之《南邻樊明府久不还家因题林亭》,蜀刻本作《湘南徐明府余之南邻久不还家因题林馆》;乌丝栏诗之《送张处士》,蜀刻本作《送鱼思别处士》;乌丝栏诗之《送苏协律从事振武》,蜀刻本作《送楼烦李别驾》;乌丝栏诗之《题李元之幽居》,蜀刻本作《赠高处士》。这四组诗题的异文性质与其他诗题不同,乃是受赠人发生了变化,其中也存在文本讹误的可能性,如首例中“樊明府”“徐明府”间可能即有一误,但不可能全是文本讹误。乌丝栏诗由许浑本人写定,自当可靠,蜀刻本经上文讨论知是诗人后期定本,二本之间为何会产生如此大的歧异?由于现存资料太少,尚无法掌握足够证据彻底解释这个疑问。但是,许浑诗中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或许可以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较为合理的推测。

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论许浑诗云:

许浑《呈裴明府》诗云:“江村夜涨浮天水,泽国秋生动地风。”《汉水伤稼》亦全用此一联。《郊居春日》诗云:“花前更谢依刘客,雪后空怀访戴人。”《和杜侍御》云:“因过石城先访戴,欲朝金阙暂依刘。”又《送林处士》云:“镜中非访戴,剑外欲依刘。”《寄三州守》云:“花深稚榻迎何客,月在膺舟醉几人。”《陪崔公燕》又云:“宾馆尽闲徐稚榻,客帆空恋李膺舟。”《题王隐居》云:“随蜂收野蜜,寻麝采生香。”《呈李明府》云:“洞花蜂聚蜜,岩柏麝留香。”《松江》诗云:“晚色千帆落,林声一雁飞。”《深春》诗云:“故里千帆外,深春一雁飞。”又《寄卢郎中》并《赠闲师》皆以“庾楼”对“萧寺”,见于其它篇咏以“杨柳”对“蒹葭”,以“杨子渡”对“越王台”者甚多。盖其源不长,其流不远,则波澜不至于汪洋浩渺,宜哉。杜甫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欲下笔,当自读书始。^①

葛氏敏锐地观察到许浑诗作中众多诗句在文字、对仗、句式上重复。其实唐

^①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人集中诗句重复的现象并非只有许浑,笔者所见,如卢纶有《题念济寺》诗颌联云“故友九泉留语别,逐臣千里寄书来”,二句又见于其《得耿湓司法书因叙长安故友零落兵部苗员外发秘书李校书端相次倾逝潞府崔功曹峒长林司空丞曙俱谪远方余以摇落之时对书增叹因呈河中郑仓曹杨参军昆季》诗颌联,同人《送太常李主簿归觐省》五律第七句“上堂多庆乐”又见于《送从侄滁州觐省》第七句;钱起《送李九贬南阳》七律后四句“霜降幽林沾蕙若,弦惊翰苑失鸳鸯。秋来回首君门阻,马上应歌行路难”又作《晚归严明府题门》七绝。看来这种情况并非只有许浑诗中存在,葛氏认为是许浑读书不多导致下笔时缺少变化所致,其实也不排除诗人对某一联、某一句钟爱有加故在不同诗作中反复使用的可能。

此外,更有两首诗篇幅大部分相同者,如:

暝投灵智寺渡溪不得却取沿江路往

双岩泻一川,回马断桥边。古庙阴风地,寒钟暮雨天。

沙虚留虎迹,水滑带龙涎。却下临江路,潮深无渡船。

晚投慈恩寺呈俊上人

双岩泻一川,十里绝人烟。古庙阴风地,寒钟暮雨天。

沙虚留虎迹,水滑带龙涎。不及曹溪侣,空林已夜禅。

除第二句及尾联外,其余五句均同。

《暝投灵智寺渡溪不得却取沿江路往》见蜀刻本卷下,《晚投慈恩寺呈俊上人》则见蜀刻本《拾遗》,与上节所论《太和初靖恭里感事》见蜀刻本卷下而《闻开江宋相公申锡下世二首》见《拾遗篇》情况类似,有可能是定本与初稿的关系。

除此之外,其他几组从主题上看有一个共同点,即多为唱酬之作。唱和诗在许浑以及其他唐人诗作中都占有非常大比重,是当时人社会交往中一项重要内容。频繁的唱酬活动对诗人的创作是一个考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随时随地创作出与情境贴合的唱酬诗作。面对这种挑战,每个诗人采取的应对措施不尽相同,对于许浑来说,或许将此前较为满意且贴合情境的成作或成句重复使用正是他解决此类困难的办法。乌丝栏诗中有《将赴京师津亭别萧处士二首》组诗,而蜀刻本中其“樽前万里愁”一首题为《将赴京师蒜山津送客还荆渚》,“津亭多别离”一首则题为《送客归峡中》,成为两首独立诗作,很有可能就是许浑为应付唱酬需要而将原本组诗中析出一首重新拟题以塞责。

《送张处士》与《送鱼思别处士归有怀》、《送苏协律从事振武》与《送楼烦李别驾》、《题李元之幽居》与《赠高处士》这三组同诗异题也均为唱酬之作,与上文所论唱酬诗作中语句重复情况类似,很有可能也是许浑将此前诗

作改换题目,后来编集时存其一首而删去另外一首,故而导致乌丝栏诗真迹与蜀刻本之诗文相同而诗题有如此差异。

清楚乌丝栏诗与蜀刻本各自的版本性质之后,考察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时应当结合诗人在创作和编集时的复杂情况以寻求合理解释,不宜简单地归之后人所改。

综合上文讨论,乌丝栏诗真迹由于为许浑亲笔所书,其可靠性毋庸置疑,但是,在许浑诗集版本谱系中,从真迹书写时间、改动以及编排等情况来看,其性质应当是许浑诗集早期的修改稿,而非最终定本。以蜀刻本为代表的传世诸刻本,虽然无法如乌丝栏诗真迹一样追溯到许浑亲笔书写之本,但是从文本证据来看,其来源应当是唐五代时期流传的版本。相对于乌丝栏诗真迹,蜀刻本的文字更接近于经过诗人修订之后的面貌,其祖本应当就是许浑诗集的最终定本。研究者仅据乌丝栏诗真迹为许浑手书这一点便质疑蜀刻本等传世版本的可靠性,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六、余论

明清文学家、学者的文集稿本存世数量较多,学者以之与刊刻出版的文集定本对比,往往能够发现其中存在众多不同,从而揭示其文集由稿本至定本的修订过程。唐代距今已超千年,绝大多数诗人的诗集能够传世已属不易,稿本能存世者更微乎其微,故而学者对于唐人别集的研究较少关注稿本、定本等问题。由许浑乌丝栏诗真迹存诗与蜀刻本《许用晦文集》的对比可以发现,唐人诗歌创作中同样存在由稿本到定本的修订过程,这对于唐诗的创作、流传等方面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是由于存世版本稀少,缺乏稿本之类的材料加以对比,导致这一过程无法被充分揭示出来。

存世唐诗异文数量众多,清编《全唐诗》中保存了一部分,实际异文数量更多。这些异文中除了一部分是由文字讹误导致者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文字讹误,虽然已经引起学者注意^①,并有相关探讨已经指出这些异文可

^①郭再贻《杜诗异文释例》较早从训诂学角度关注唐诗异文(收入《训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8-105页),此后如杨建国《〈全唐诗〉异文说略》(《文献》1995年第1期,第3-17页)、黄灵庚《唐诗异文讹字例释》(《文献》1996年第2期,第12-20页)等均从校勘、训诂等角度讨论唐诗异文。随着对唐诗异文的关注逐渐增多,产生了一系列以单一诗人诗歌异文为中心探讨唐诗异文的成果,如杨冰郁《唐诗异文研究——以李白诗歌异文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李偲佳《李商隐诗歌异文研究》(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房本文《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异文刍议》(《文学遗产》2012年第3期,第59-67页)等。

能与作者的前后修订有关^①,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手段加以区分,限制了这些异文在研究唐诗中的作用。通过许浑诗集的对比可以看出这些异文的出现与诗集不同版本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这可以为唐诗异文的考察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即追溯这些异文源出的版本,探索这些版本与诗人稿本、定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如此或许可以为唐诗文本异文的研究开拓出新的局面。

【作者简介】赵庶洋,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唐代文学文献,古籍整理研究。

①邓亚文《论唐诗异文》指出“唐诗异文形成的原因”有“初稿和修改稿先后流传,形成异文”和“后人对唐诗进行修改,形成大量异文”等(《咸宁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第68-70页);房本文《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异文刍议》指出唐人选唐诗与今传李白集诗歌异文出现的原因“很可能是李白自己对诗稿作过一些修改”(第62页);陈尚君《唐诗文本论纲》也指出“一首诗存在大量异文或有完整残缺的记录,原因很复杂。必须考虑作者本人修改和作者诗意重复的因素。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何尝不是所有诗人的写照。杜牧《张好好诗》真迹和《樊川文集》收录本的文字差异,并非流传造成,应该是此度真迹和他写给外甥裴延翰并编入文集的文本的差异。即便率性作诗的李白,也可找到确切本人改诗,乃至将原诗改得几乎完全不同的记录。”(《唐诗求是》,第5页)